

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考古、博物馆等工作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拓展,对专业人才也呈现出旺盛需求,加之考古、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年轻一代对于原本相对冷僻的考古文博类专业心驰神往,使得近年来报考高校相关专业的学生人数不断攀升。

为及时呼应行业与社会需求,国内高校也在积极蓄势储能。近日,国务院学位办发布了新增学位授权点和授予单位的公示,又有一批高校将增设考古学和文物专业,成为博士、硕士授予单位,为未来考古文博人才的培养增力赋能。与此同时,已开设考古文博相关专业的高校也在积极思考如何更好地优化完善,以进一步提升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水平。针对高校考古文博人才的培养,笔者谨此谈几点粗浅看法,以求教诸位方家。

人才培养的目标与面向

文物事业的工作范畴很广,对象也类型丰富,这意味着考古文博单位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非常多样,也就要高校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能“一专多能”,而不是只能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

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首先是要有“多元化面向”。目前大多数高校的相关专业或方向,大体可分为“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等不同类别。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这种分类基本是合理的,可以有利于因材施教、按需培养。但与此同时,针对基层编制较少、专业人员要具有“多面手”的工作能力这种实际需求,高校就要考虑如何实现融通式全科人才培养,使所培养的学生能够很快适应不同工作要求,很好地完成多种目标任务。其次,是要完善“多层次结构”。一般来说,各高校的专业人才培养,“博士研究生”侧重于理论研究与科研创新,“本科生”侧重于基础学习与应用实践,“硕士研究生”则作为二者间的过渡与衔接,从而形成一种较为合理的“金字塔型”结构。但是目前来看,个别高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数量逐渐在超过本科生的数量,呈现出“橄榄型”结构;部分跨专业考考古文博类硕士研究生的学生,因为在本科阶段没有经过较为系统的专业学习,基础不太牢固与扎实,尽管这些学生也会花费很多时间在专业基础知识的补充上,指导教师也会给予尽可能多的关注与指导,但毕竟学习时间有限,还是有可能影响到最终的培养质量。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适当增加高校本科生的招生数量,适度提高专业本科生推免读研的比例。

在学科建设方面,则要形成“多维度体系”。如前文所述,考古文博专业的行业需求与就业面向非常多,不同高校就要根据自身的学科传统、不同的生源、不同的行业需求等,综合考虑各自的学科发展侧重点与优势特长进行规划与建设。本科培养阶段可以更侧重于“全链条”标准化专业基础训练,而对于研究生培养阶段,则可以结合不同高校的办学特色与优势,各自发挥所长,形成多维度的学科建设方向。其次,就是要进一步强调“多学科交叉”。现在一提“多学科交叉”,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文理交叉”,而且往往多聚焦于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文博领域的应用。其实,考古文博工作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复杂多样,就决定了“多学科交叉”不只有“文理交叉”这一种模式,而是要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比如说,在研究古代社会组织形态发展时,考古学就要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交叉,以引入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在研究古代社会的宇宙观时,就要与哲学、宗教学、天文学等进行交叉,引入这些学科的视角、思路与分析方法;在研究古代民族交流融合时,就要与历史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等进行交叉。以上所述,大多数都是考古学与传统的人文、社科领域的专业进行的交叉。

当然,在高校进行人才培养时,不是要把这些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与理论方法灌输给学生,而是要传递给学生一种“学科交叉”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思路。这样一来,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实践中,就不只是停留在对物质层面的认知与描述,而是“透物见人”,更多地关注与思考创造这些“物”的人。”

对于培养考古文博人才的高校,首先要探索“多主体办学”的模式。随着近年来的考古文博热,很多高校开始设立了相关专业,但是目前主要还是以公办高校为主。要形成“金字塔型”的人才培养结构,就需要由不同办学主体共同承担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任务。考古文博学科具有传统优势的高校,更多的是要承担起培养拔尖型、示范型、研究型引领人才,并向科研机构和其他高校输出的任务;而一部分新设立考古文博专业的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则可以以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入手,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教育主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则可以将一部分资源向后者倾斜,以解决基层单位专业人员匮乏、人才结构不合理和行业需求痛点等问题。其次,就是“多模式考核”机制。因为办学主体的多元性和办学模式的多样化,也就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不能采用同一套评估标准针对所有开设考古文博相关专业的院校,而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培养模式与任务,采用不同的考核模式进行评估。具有传统优势的高校是要发挥学科建设领军作用的,当然要从教学、科研等不同维度进行高标准、严要求的考核;而对于侧重于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校,则可以侧重于人才输出的质量、基层单位的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考查,以凸显这些学校的优势与特长。

关于高校考古文博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张颖岚

需要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标准”与“特色”的关系

对于学科建设而言,每个高校固然都有自己的学科特色与传统优势,但在考古文博相关专业的本科低年级教学阶段,则要更加强化教学内容、培养模式、培养目标等方面的标准化、规范化,按照国内高校多年探索形成的共识与模式设计相对统一的培养方案、教学流程,而不能迁就于某个学校已有的师资队伍现状“因人设课”。至于到了本科高年级阶段和研究生阶段,则可以通过设置一些特色课程,以凸显不同高校的优势方向、学术传统与教师的个人学术兴趣。其实这一点,在以往还是为大部分高校所共同遵循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开设考古文博相关专业的学校不断增加,个别高校有可能会因为缺少师资、经验不足等因素而出现不甚规范之处,这是值得审慎关注的。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考古文博工作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领域,因而,在高校教学环节的设计中,就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并重。比如说,在考古专业本科学习阶段,办学模式相对成熟的高校往往会安排长达一年的田野考古实习,事实证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实践操作能力非常强。但是近年来,实践教学环节在个别高校却有可能流于形式,这一方面是因为部分高校实习实训的基础条件不足,还有一方面原因则在于,现在本科学生的就业、升学压力非常大,很多学生在高年级阶段主要是为考研做准备,因而不愿意在实习中投入过多的时间与精力。这就需要高校和行业部门共同思考解决方案,有几种思路:一种就如山东、山西、陕西等省正在实践的“定向培养招生”模式,使本科学生在在学习阶段没有毕业择业的后顾之忧;另一种,就是采取“本硕贯通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在高校招生时遴选一部分专业意愿明确的优秀生源进入该模式学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这一问题。

“博雅”与“专精”的关系

这一点,主要是针对课程设计和培养方案而言。如上文所述,考古文博人才的培养需要进一步强化“多学科交叉”,所以在本科培养方案里面就需要多列入一些人文、社科、理工等不同学科门类的通识性课程,以便于学生开拓视野。专业课程则需要通过“标准化”的课程设计与培养方案,建构起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体系。目前看来,大部分高校在“专精”培养方面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在“博雅”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有限,过多的通识课程学分要求可能会影响到专业课程的学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校内院系间的协同不够,无法很顺畅地共享彼此的课程资源。关于这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解决方案:一是在学校层面鼓励多开设面向全校的开放式通识课程;二是将这些通识课程的学习周期减少,改成低学分的短学期课程;三是在培养方案中列入通识课程的学分选修要求。

“基础”与“应用”的关系

现在偶然能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有些文博单位会反馈说,个别毕业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不足,不能很好地适应工作需要。关于这种情况,高校的准确需要及时汲取具有建设性的反馈意见,进行人才培养环节的优化完善。不过,学生到考古文博一线工作以后,所面对的具体工作对象往往会与在学校学习的体系化知识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高校不仅仅是传授给学生具体的知识与技能,更为重要的是给予他们科学思维、理论方法、研究范式等方面的学术训练,以及探究式的学习方法和知识更新的学习能力。所以,高校还是应当按照自身的学科传统与教学规律开展人才培养,重视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理论方法的学术训练,而不过多地迁就于应用层面的一时之需。

“强基”与“拔尖”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本科阶段的学习对于巩固考古文博人才的专业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项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因为显示度不是那么强,个别学校也担心自己花费心力培养出来的优秀本科生最终却“花落别家”,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这也正是教育部强调“以本为本”(大学应以本科教育为根本)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尽管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学科特色与传统优势,但在考古文博相关专业的本科教学阶段,还是要进一步强化标准化建设,有针对性地设计规范化的培养方案、培养过程与培养目标,为学生筑牢坚实的专业基础,也就有助于未来人才发展的“拔尖造峰”。

“共建”与“共享”的关系

考古文博相关专业是紧密依托行业发展的学科领域。因而,在学科建设、学生培养、就业去向等各个方面,高校与行业间都是一种“共建、共享”的关系。一方面,高校可以采用双导师、兼职教师等方式,通过动态柔性吸纳行业内的专家学者作为师资,以提升自身的人才培养能力;与此同时,高校也可以通过为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提供继续教育与深造提升的机会,促进文物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行业不仅可以为高校提供实习实训的基础,也可以为高校教师提供科研基础资源,还可以及时反馈行业人才需求,促进高校学科建设的良性发展。但是目前来看,因为各自的机构属性、目标、任务不同,高校与行业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十分紧密,也没有形成非常稳固的常态化合作机制,这是需要在未来加以重视并共同努力提升之处。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2017年4月1日,新华社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几年来,雄安新区强力推进起步区市政设施、生态环境整治,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项目建设,雄安新区建设正可谓如火如荼,日新月异。现在,容东片区整体城市框架结构已经初具规模,6万多征迁群众喜搬新居;京雄城际铁路建成并运营,京雄高速公路河北段建成通车。雄安新区留下的不仅仅是城市建设者忙碌的身影,还有考古工作者穿梭于城乡田野踏查的脚步。正是考古工作的提前介入,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腾挪了空间,保障了雄安新区建设的顺利进行,雄安新区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先考古、后出让”考古前置的雄安模式。

与时间赛跑,抢在雄安新区建设规划的前面

2017年4月上旬,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完成《河北雄安新区考古调查计划》《河北容城南阳遗址2017年度考古工作计划》。6月,在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推动下,国家和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机构组成的9支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对雄安新区2000平方公里全境范围开展考古调查。到12月底,完成容城、雄县、安新、高阳及任丘五个县市的33个乡镇,640个行政村,2050平方公里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遗址263处。以此为基础,2018年3月,编制完成了《雄安新区文物调查报告和文物保护专题报告》,由省文物局提交给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部门,将文物保护纳入雄安新区建设总体规划。考古调查期间,国家和省文物局领导多次到雄安新区调度指导工作。

开展遗址价值评估,采取分类保护措施

针对雄安新区263处不可移动文物遗存地下文物遗存埋藏多,地上文化

1986年4月至5月,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野盗捞瓷器,引发中国政府和文物部门的关注,使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开始孕育。这项事业可谓是临危而建,应运而生。要建设这样一项事业,人才基础必不可缺。注重人才储备与培养,也成为水下考古事业自创建以来,一以贯之的核心要务。站在2024年的时间节点,回首看我国水下考古三十八年的发展历程,人才队伍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主要采取学习外国经验,引入外国理念的模式,建立起人才班底,使我国水下考古人才队伍从无到有建立起来。是水下考古人才队伍的初创阶段,时间为1987年至1998年。

在1987年,我国的考古事业发展虽已经历六十余年,然而对于如何从无到有地搭建水下考古这样一门分支工作,培养水下考古的专业人才,学界仍需摸索方法。为了解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水下考古理论,我国文物部门采取“走出去”的模式,于1987年6月、1988年9月分别派遣三名青年学者,赴荷兰、日本学习水下考古及潜水技术,并参与当地的水下考古工作。此三人也就是我国第一批出国门学习世界水下考古经验的学者,他们带回的知识为我国自主创立水下考古事业提供了重要参考。

1989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联合组建中日合作南海沉船调查队,对广东省台山县上下川岛海域的宋元时期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而这三位最早学习国际水下考古经验的青年学者都参与了这项调查工作,亲手触摸到了这艘沉船。这艘沉船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南海I号”,一路见证了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成长。

为了进一步加快水下考古事业的成长,在派遣学者“走出去”的基础上,国家文物局决心将国外专家请进来,以便更大规模地培训我国学者学习水下考古知识。1989年9月,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西澳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培训班”在青岛开班,来

『先考古、后出让』考古前置的雄安模式

张文瑞

沧海横流 潮头击楫

我国水下考古队伍发展历程 王亦晨



郑州古城墙



容城城子墓群M7墓室平面布局

容城出土战国时期“西宫”铜壶



考古前置,优化营商环境

为支持雄安新区工程建设项目简化审批制度改革,推进起步区规划建设,在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2020年10月以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前开展雄安启动区200平方公里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对白龙遗址、李

自澳大利亚的专家为我国的11名学员进行了水下考古的系统培训,这11位学员不仅是我国国内自主培养的第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才,也是在此后的岁月里成为建立水下考古事业的中流砥柱。

1991年至1997年,在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以“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培训班”的学员为中坚,完成了对沉船的调查与发掘。这是我国第一次完全以国内专家组成队伍,完成的水下考古发掘工作。这标志着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已经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具备了独立开展调查与发掘工作的能力。

第二阶段

主要采取自主培养的模式,在第一阶段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形成一套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为水下考古人才队伍不断造血,进而在全国铺开水下考古工作。时间为1998年至2009年,是水下考古人才队伍的发展阶段。

1998年7月,举办“第二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培训班”,2004年4月举办“第三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培训班”。这两期培训班完全由我国自己的水下考古力量负责培训,确立了水下考古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培训模式,共培养了学员41人,其中很多人至今仍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骨干、领军人才。

水下考古人才的蓬勃发展,浇灌了水下考古事业的茁壮成长。中国水下考古人从此扬帆于西沙千里石塘之上,穿行于沿海万顷碧波之中。尤其对“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轰动全球,成为举世瞩目的盛事。

雄心勃勃的中国水下考古人,也从此开始走向世界,由最初的去外国请专家培训,到此时的外国专家进行培训。2007年6月,在广东阳江的水下考古科研与培训基地举办了“第四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培训班”。培训学员13人,其中有两名来自非洲国家肯尼亚的青年学者。他们回国后致力于创立本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并为此后开展的中青合作水下考古项目做好了先期准备。

第三阶段

在注重基础人才培养的同时,开始采取提升培养层级、拓展培养科目的新模式。随着水下考古理念向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蜕变,水下考古人才的培训也进入了空前发展、百花齐放的新时代。时间为2009年至今,是水下考古人才队伍的升级阶段。

首先是坚持优良传统,继续夯实水下考古人才基础。从2009年至今,又举办了第五期至第九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培训班,使我国接受过国家培训、认证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队

茂遗址等11处文物遗存进行文物勘探,勘探面积91万平方米;对午方遗址、沙窝墓群、张六西遗址、郭村遗址等8处文物遗存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4830平方米,清理古墓葬180余座,取得丰硕考古成果。同时,根据文物保护需要,雄郑路二期工程、环淀路一期工程修改设计方案,避让文物遗存,新方案增加成本达1.3亿元。确保了工程建设中文物得到有效保护。

现代科技手段应用,提升考古科技含量

开展雄安新区环境考古工作,使用遥感影像、RTK、激光测高仪、标准土色卡等技术手段开展调查工作,对白洋淀区域106处各种自然地理剖面进行了调查和记录。建立了晚更新世晚期雄安新区地层的时空框架,复原区域河湖演化的过程。同时,重建南阳遗址两汉时期宜居生态环境,为雄安新区建立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开展雄安新区中期发展区200平方公里范围机载激光测绘工作,获取区域机载三维激光点云数据,通过相关软件和方法进行滤波等数据处理分析。将数字正射影像、被过滤植被及房屋后的地面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结合历史航空影像、历史考古资料,本年度调查结果叠加分析显示出遗址现象疑似点与古河道等详细情况,为实地勘察提供佐证。

以雄安考古为契机,推进考古勘探、发掘标准化建设

结合雄安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建立起河北省考古综合业务管理平台,通过各个考古发掘项目时空信息采集、处理、存储管理、分析、应用和展示等技术创新集成,实现了考古数字化资料的安全存储、快捷检索与分析研究规范化标准。广泛推广使用无人机航拍、航测、RTK测绘、GIS系统、三维扫描和影像重建、高清、近景及延时摄影测绘等技术手段,提高考古技术工作精准和效率,极大地丰富了田野遗迹信息提取的广度和深度。数字化考古技术的应用、推广,极大提高了考古发掘工地管理水平与考古发掘质量,为河北省考古工作树立了“雄安标准”。

综上所述,雄安新区考古前置工作,促进新区经济建设,凸显雄安新区在基本建设中坚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文物保护优先的决心和理念,在全省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中发挥了引领和示范效应,为完善“土地收储、考古前置”制度提供“雄安经验”。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伍,达到了166人。这些专业人员分散于全国各个考古文博单位,国家则在必要时召集他们,共赴某一地的水下考古项目,形成了一提考古“全国一盘棋”的宏观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首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下考古专业培训班”还培训了来自柬埔寨、泰国、伊朗、沙特6名外籍学员,并且为在国内国家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锤炼专精技能,提升水下考古人才能力。2009年至2023年间,先后举办了九期进阶技能培训,共培训131人次。培训内容包括60米与80米深度下的技术潜水、沉船潜水、洞穴潜水等各种专项技能,使得水下考古人才队伍呈现多样化发展,更好地保障水下工作安全、提升专项技能,拓展水下考古工作领域和空间,以应对水下考古事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客观需求。

第三是重视文物保护,强化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概念。2009年至2023年间,共举办了七期出水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共培训学员113人。正如水下考古在考古领域是一个特殊的分支,出水文物保护在文物保护领域同样有其特殊性。出水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针对不同材质的文物研究其保护修复方法,并与实践紧密结合,在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对“南海I号”出水文物保护修复实践,在积累操作经验的同时,也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纵观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我国水下考古人才队伍建设在不同维度都体现了一定的变化规律:在对外交流方面,从向外国学习先进经验,到将自身的技术与心得传授给外国学者;在队伍规模方面,从只有十几人的三道岗沉船发掘队伍,到遍布全国、拥有百余人的坚实力量;在核心理念方面,从水下考古技术的不断精进,到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全面铺开。水下考古的人才队伍建设呈现出了蒸蒸日上加速度发展,欣欣向荣的全方位发展。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踏进水下考古的领域,随着水下考古这项事业的内涵不断深化丰富,越来越多的成果不断横空出世,吸引了广泛的关注。若论今日之成果繁盛,皆因人充实、文武兼备;欲向未来之事业发展,须看大道相继、薪火相传。水下考古着眼于培养青年人才,在校学生在作为后备军,也早有传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刚刚举办过“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培训班”的时候,厦门大学就已开设了海洋考古课程。到了2019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为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专家在山东大学开设水下考古概论课程。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更多有志青年投身此道,为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添砖加瓦。

(作者单位: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